



近代中国音乐

A Research on the **思想史论**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Music Philosophy

余峰◎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近代中国音乐

A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Music Philosophy

思想史论

余峰●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余峰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006-8935-5

I. 近... II. 余... III. 音乐-艺术史: 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J6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630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07781

责任编辑: 李杨 candie_li@163.com

营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4017809

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330千字

版次: 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4035821

序 言

一、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与意义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所选对象与范围,主要以近代一百多年(1840—1949)中西音乐文化相遇后,所发生发展而成的“国乐”、“西乐”、“传统音乐”、“新音乐”、“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等文化事象中所彰显、隐含的各种交互叠织的音乐思想为研究对象。近代音乐是近代人的,近代音乐文化也是近代人的,而作为近代音乐文化中的思想更是近代人的。本研究以此为契机,以音乐——文化——人物——思想为内容,以音乐思想问题为轴心,在究其音乐思想、音乐行为、音乐审美等生成机制之成因的同时,试图客观准确地梳理其内在学路之关系与脉象,评估其对于现实与后世的影响。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与其相关的学科有着明显的差异,首先,其性质在于注重音乐家心性和作品意蕴的文化解释功能,史论结合,涉猎范围宽阔,重点尤为音乐家在历史中形成的思想与人生社会种种活动的直接关系。其研究不仅要探讨一般音乐思潮,同时还要涉及音乐影响人群精神状态。具体讲:“道统”的传统音乐思想,“主流”精英的“新音乐”思想以及“无产阶级”文艺系统的音乐理论构想固然在深究之列(如音乐的“国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等思想)。一般“民间音乐思想”的音乐心理反应、音乐趣味与社会时尚,思维习性与技能演绎,同样是本研究关照的对象(如:“戏场如学堂”的乐观、对戏曲音乐改良的“民间行为与实践”、音乐上复古主张的“个人倾向”、与域外音乐文化交流所获的“民间经验”等)。因为音乐行为上“不合理”的情感、情绪冲动,往往对音乐历史的社会变化会产生重大影响。其次,音乐史学的视角对怎样治思想史,与音乐美学意义上的思想家讨论音乐思想,在立场、目的、方法上是不同的,虽然两者同样是讨论思想,可音乐美学家主要以批判与辨析概念是非、正误、真伪、美丑、以致

精确的定义为目的;而音乐史学的思想研究则较多注重它们的性质,时代意义,以至影响的范围。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作为一个课题,诚然属于音乐史学的范围。但是,在音乐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之中,它与其他分支学科(如音乐教育史、音乐美学史、作曲史等)的区别却是通过音乐思想这个主题而体现出来的,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它以音乐思想的历史进程与变化重叠作为特定的题材领域和研究对象,所以,它必然要从历史的角度探究音乐思想的意义。

音乐思想史研究对近代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是一种复合性和内在性的学术支持。事实证明,近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不能没有思想史研究成果的贡献和支持,音乐思想史研究的经验,对其历史认知与未来发展有积极的启示和意义,研究近代中国音乐思想的历史,是为了夯实音乐史学科、学理基础,拓宽学科领域,以便未来发展更为合理。因此,对于近代诸多繁杂的音乐思想问题的研究,重要的不是在于整理过去,而在于从整理过去中寻求能够对未来学科发展有启示的东西。该研究在这方面试图作些思考和努力。其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与价值预设的启示如下:

1. 确立“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的学科地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音乐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的总体发展就必将因缺乏后劲而自然萎缩。不争的事实,近代中国音乐史学学科 50 多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1958 年的创建实践与得益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近代音乐史学恢复后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但遗憾的是,近代音乐史学科体系的完善今天看来并不理想。在当今时代,陈旧而无序的学科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一流的学术的。增强音乐思想史的研究,有助于近代音乐史学学科的完善和整体发展。

2.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应倡导兼容并蓄和批判创新并举,不可偏废。有分析地吸纳国外的前沿理论和先进方法,有助于近代音乐思想史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但是,这还不是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生命力所在。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生命力应是自己的理论创新,其理论创新的基础,一方面是对前沿理论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对史料文献的深入研究

和人文阐释。因此,对于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的学科建构而言,兼容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3.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面向相关学科的资本,取决于对自身的系统研究。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的音乐思想,二是发展中的音乐思想。前者作为一种独特的音乐文献对相关学科有意义;后者作为音乐生成的经验也对相关学科有意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是个多元开放性的思想史研究课题。

4.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应走以人为本、学术为本之路。多年来,该学科的研究成果有:张静蔚的《近代音乐思潮》,李岩的《近现代国乐思想研究》,明言的《20 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吴学忠的《近代“国粹主义”音乐思想产生、演进、发展过程的研究》,冯长春的《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等。他们的研究在该学术领域具有开拓性,但之后真正能支持学科或学术领域发展的论著不多,原因是近代音乐思想研究多元的人文解读性和学术性不够,学科和学术发展没有高质量的论著支持,也就等于没有发展的基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要追求规范体系和创新性,就该取以人为本、学术为本之路。

5.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应从小到大、微观到宏观、单线到多元、圈内到圈外、本我到另类等作为价值取向。今天,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日益密切,“国乐”、“西乐”、“传统音乐”、“新音乐”、“革命音乐”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影响,许多音乐文化现象无法用纯而又纯的音乐理论来分析和研究,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来分析和研究。例如: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国乐”、“西乐”、“革命音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从单纯的“体系音乐学”概念出发,去思考和研究音乐问题了。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必须借助它山之石,方可攻玉。

6.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不仅只做梳理挖掘近代音乐家个案和文献史料的“考古”工作,而且还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和较明显的现实意义。如: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重释,要认同吸收近代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

下形成和实践的音乐理论及观念,在发掘它的解释功能的同时,着力探索其在现今音乐文化转型时的适用性,并建构音乐文化上多元解释的新语境,消解音乐霸权理论与音乐社会行为之间的差距和不平衡,推动该领域和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发展。

二、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历史发展的轨迹与形态特征

音乐思想价值观的变异是社会总体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40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激变,中国音乐文化也在与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步入了急剧而艰难的转型历程。本研究通过考察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变异的历史轨迹,揭示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形态转型的基本模式与特征,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1. 上世纪初,西方音乐以“全球化普世价值”的优势征服了古老的中国,从此中国在不知所措之间被迫走上了音乐近代化道路。在整个近代中国的一百年间,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中国人对西方音乐文化的认识发展过程相适应,中国音乐思想观念形态在近代的转型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对西乐“铿锵妙曲,戛击新声,玉润珠圆,闻者忘倦,虽郑卫之音不是过也”^①之神韵认同的萌芽阶段到“西乐哉!西乐之为用也,常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造国民合同一致之志愿”^②的社会功用层面,再到“把音乐的艺术当做是一种世界的艺术”^③的精神层面逐步推进的过程。其中,洋务运动中对西乐“误识”的个人行为、学堂乐歌运动的兴起、五四“新音乐”文化运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音乐文化思潮的形成,显示出近代中国音乐思想观念形态四次重大的转型模式特点。洋务运动中对西乐的“误识”行为是与“西乐”文明对话的一次“误打误撞”;而戊戌变法后的学堂乐歌运动,才是真正以引进“西乐”观念为特征并首次付诸大规模实践的一次音乐思想运动。这次运动以西乐

① 张德彝,《四述奇》,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19页。

② 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张静蔚,《搜索历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37页。

③ 青主,《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张静蔚,《搜索历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91页。

精神文明冲击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冲击了传统音乐文化中的“礼乐”观念和视“音”技术为“奇技淫巧”的观念,形成了近代中国音乐思想观念形态的“新界域”。

2.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形态的变异是在不均衡的两种文明之间相互交织,救亡与侵略势同水火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与“西乐”既彼此冲突又相互融合的矛盾过程中,中国音乐思想观念首次从整体上审视和认识到自己,使其自身的转型呈现出了鲜明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近代中国音乐思想观念的转型是在中西音乐文化彼此冲撞而又相互交融的过程中进行的。二、引起中西音乐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两种音乐文化产生的背景及其内涵、形式等方面的差异。三、在近代中国的一百年间,音乐思想观念转型始终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抵牾,而中西音乐文化的碰撞和由此引发的“古今之争”、“新旧之争”则成为矛盾和抵牾的焦点,中西音乐文化的交融自始至终是在强势与弱势、“民族化”与“化民族”的激烈冲突和吵嚷中进行的。

3.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观念形态转型的进程,始终是与救亡图存的政治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音乐观念与社会政治的密切相连,使近代中国音乐思想的主流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现实,是西方列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这就决定了解决这个危机、挽救民族危亡是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然而,音乐思想观念毕竟不是政治的附属品,而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转型也有其内在的特点和规律,并非靠单纯的政治运动就能达到目的。近代一百年政治事变和运动频繁出现,无论哪种力量都要求音乐思想为政治服务,这样往往过分强调了音乐的致用,盲目地注重功利主义,而忽视了音乐自身的独立性,对其自身的价值和建构重视不够,从而影响了音乐在学理上的深入研究。

4. 近代中国一百年间,作为音乐思想观念形态转型成果的近代音乐,在内容上既丰富多样,又浅显无学理,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成熟的中国近代的音乐思想理论体系。近代以前,中国音乐是以传统的民歌、说唱、戏曲、民族器乐等为核心。之后,随着西乐的不断输入和传统音乐地位的衰微,中国音

乐从形式体裁到内容题材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具体表现为从音乐的单一类型走向多样化。如:近代音乐教育制度的形成,以及教育领域中新式学堂所开设的“歌乐”课;以西方音乐观念、音乐语言、音乐技艺等为创作基础的“新音乐”的兴起;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音乐传播机构、新的音乐学科门类的产生;在音乐思想视域中关照音乐的新角度、新研究方法的出现等,无不体现出中国音乐思想观念形态在近代的演化,与传统音乐观念的单一性相比,表明了它在内容、结构等方面的丰富和多样化。

5. 中国音乐的近代化道路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为以后创立了“中西合璧”音乐思想形态上的范例,为近代中国音乐创作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这既是对传统音乐思想的继承,也是对传统音乐思想的“扬弃”;是音乐价值观念的更新,也是音乐思维方式的革命和音乐审美的新追求。从价值观念来讲,传统音乐价值观属于重“礼”轻“乐”的社会功用型模式,而西方音乐价值观属于乐艺、乐音、乐理、乐思并举的复合型模式,双向交合,为近代中国音乐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行为方式来看,传统音乐的行为方式强调“乐”服从于“礼”,是一种心灵内倾的凝聚型行为模式;而西方音乐的行为模式追求的是人的创作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人性宣泄与自我表现,是开放发散型的行为模式。将二者加以统筹,却是中国人的一种创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双重价值观的时代表征。

三、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作为音乐史的一种研究途径,需要一定的方法。一方面,由于音乐思想涉及相关的多种理论,而理论与相应方法总是联系的,因此,它所包含的方法也就是多样性的;另一方面,从社会的整体审视音乐,以剖析音乐形态的专业技术化方法,以辩证唯物的历史态度审视音乐历史事象,以精神分析式的音乐美学理论关注音乐家或作品中的人物内心世界,以及用政治思想研究中侧重于政治立场的阶级斗争分析法等,应是本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些重要方法,但在具体研究中绝不会只执著于某一方法。因为近代中国音乐思想的历史研究不只对“专家立场”、“权威观点”进行研究,而且还着眼于音乐社会生活的“现实场景”,从音乐的现实状况分析出

发,发现可能有价值但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就是说,怎样把近代音乐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如何考察和关照传统音乐与近代西乐的演变互动关系、西方音乐家与本土音乐家的实践、近代人作为当事人的音乐态度等历史事象,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析诠释近代音乐历史中相关的历史个案,在繁复的近代音乐文化整体中梳理其音乐思想的脉络。显然,至今没有一套属于音乐思想研究的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一种专一的研究方法供其使用,所以本研究需要更多的方法提供更多的学术性支持,进而对其研究以期获得符合历史真实的解答。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其音乐家、作品、关键词等的语意分析应该是其研究较重要的方法。因为任何音乐现象,音乐思想和观念的表述、演变和传播都离不开语言和词汇。所以,在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中,应特别重视那些表达新音乐思想和观念的词汇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出现,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类型及变化,以及如何传播并成为有其相对固定含意的普遍用语。例如,张德彝《游历日记》记述的许多零碎的西方音乐事项,其“游记事项”显露出在英国、德国以及日本的不同含意或些微的差异,进而揭示出音乐思想近代性的核心观念:“西乐”与“国乐”、“传统”与“新音乐”、“俗乐”与“高雅音乐”的对峙与关联是怎样形成的。显然,音乐思想中的传统与近代概念,实为中西、古今、雅俗等关系的总称。以往思路,总是以二元对立的运思看待它们,以弱势与强势格式它们,以先进与落后解读它们,以侵略与被侵略认同它们,使得音乐思想的研究难以跳出“国粹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理念规约下的陷阱。

就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而言,音乐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在音乐思想与历史的归属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在音乐思想史研究和创写中,社会历史的标准和音乐思想的尺度是统一的,也是不可偏废的。作为一个音乐思想史的研究者,不但要努力获得对以前音乐思想的真实历史的理解,而且也要尽可能地对以往时代的各种音乐思想的价值作出合理的分析和准确的评价。如果因为音乐思想史属于音乐历史而忽视其在音乐思想上的归属,忽视从音乐思想上把握各种音乐文本的内

在价值,甚至无力对一般俗乐与音乐经典的价值差别作出说明,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音乐思想的历史规律,更不可能为其思想史研究开拓新的视域。

如果把近代音乐思想研究的重心放在近代社会多元语境中加以思考,在书写方法与书写策略上会得到以下启发:

1.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是一个新领域。内容新,问题也新,新就新在对原有意识形态的多解视角。所以,对此研究应采取辩证唯物的历史态度予以分析。首先,在研究中的史料取舍问题上,不求新、奇、多、怪,就在习以为常、人人可见的史料中,寻进展、找突破。其次,从取舍的史料中,领悟近代多变的音乐家及其思想,小心考校,知常知变,知重大史事对音乐家及其思想、观念的影响。另外,从已有研究成果中吸取养分,但又不能只限于新概念、新名词、新技艺的意义追逐,尽量避免落入前人设下的语言陷阱,在继承发展中,努力突破其单一武断的音乐解读模式,以求治史之自由,成果多样的音乐学术新语境。

2. “歌曲音乐”在音乐思想史写作中的定位问题。音乐思想史的书写,首先,它是以音乐为本的思想史,离开音乐谈思想此为一大忌。其次,近代音乐史既然是一部救亡史、革命史、歌曲史,那么,近代音乐思想史的构思就不能没有音乐中的歌曲。为此,必须打破原有固定模式,加强歌曲音乐音响的阅读、理解和分析,并加重其在音乐思想写作中的解释分量和地位。

3.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尽管目的明确,要解决的问题也多,但近代音乐主流思想与民间意向的共构同写应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大问题。音乐思想史的真实存在,是每一个人心中的生存智慧都参与其中的显实。所谓精英的“经典雅乐”并不能代表长期被压抑的“民间俗乐”。在近代音乐的经典思想之外,一直有着民间音乐思想广泛的流布,它们稳定或持续地超越任何一个时代或社会制度的更新换代变迁之外。在那些“经典雅乐”之外,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寻找或发现的是:“民间俗乐”生存状态的真实情景;主流思想变迁的原因;权威话语的空穴来风给近代音乐的生成造成的利与弊。究竟它们有多大的思想价值?给予民间音乐思想多少概括?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如果回避或忽略了民间音乐思想这一强大的弱势群体的存在,

其书写将无厚度而显单一,相反,它将在学术上形成一个“新范式”。

4. 从学科、学术角度讲,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属于近代中国音乐史的一个分支。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音乐的学习制度中,在近代音乐史学框架里,它至今尚未成为一门真正独立而系统完整的科目,这与近代音乐史学的整体发展直接有关。如:在学术界,近代音乐史学一直被认为是“危险区”、“雷区”,至于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就更不必赘言了。因为学术一旦与政治联手,音乐研究就复杂得多,音乐事象也就难以言说,何况近代音乐历史的创造和参与者之间的私人恩怨已成了“文化”,难怪涉足此学科、此领域的学者微乎其微。然而,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学术氛围的宽松,对近代中国音乐思想的研究也应该逐渐变“险区”为“显学”。所以,“学术独立”应该是本研究操作性极强而又响亮的口号与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以“学术的独立性”作为方法论标准,对20世纪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形态的历史进行有限的辨析与清理,为近代音乐史学对这一“常识”的讨论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把在近代音乐文论的语境概念中接近于“信仰”而不被视为“知识”范畴的“政治”,作为互动的“他者”来确立书写策略。消解“政治的绝对性”和“二元对立”基本思维模式的影响,使本研究在其范围内讨论20世纪中国音乐与政治的具体意义及其这一时代的音乐家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获得有效的辨析与创获。

5. 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离不开文献史料。一本书,一个论题的学术价值,都基于对史料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分类辨析之上,因为书写者的创见性智慧均出自史料,尤其是音乐——思想——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更显其重要。事实上,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的文献史料不算少,但如何遴选取舍,问题就大了。因为,任何个别研究者都不可能阅读并牢记某一时期的全部有关音乐文献,研究者往往是选取某一部或几种音乐文献进行研究。这自然会带来一定质疑:这些音乐文献是否能反映近代人们的普遍观念?如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属官方文献,就不能代表1900年前后官僚体制外士大夫音乐思想的变化;而完全以精英知识分子的音乐想法作为普遍音乐观念之根据,可能也会受到质疑。因为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的“音乐经典”,往往是

后知之明,实际上只是某种盛行一时音乐史观的反映。随着人们音乐史观的变化,对代表过去时代的重要音乐文献和音乐家往往需要重新界定。换言之,对这些音乐文献的取舍和解读,往往因时而异。因为,资料庞杂,鱼目混珠,所呈现的陈词滥调,拾人牙慧,投时髦风气,夸诈欺世种种与音乐有关的历史书写,一概混迹期间,须耐心判断取舍:哪些属正史或野史,哪些是上流经典或民间边缘,哪些为音乐本类或社科政治等。传统音乐史学只热衷于前者,总是划出一个“防妖圈”,钦定某些“铁律”。只有正统精英的“音乐经典”,上层主流的“艺术音乐”才是音乐学术研究唯一可取的文献资材。照此,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难有建树,高品质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会大打折扣。

总之,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领域广、程度深、问题多、资料杂、学友少等诸因素,不仅给本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和难处,甚至还可能耗尽自己半生之精血而无所为。既然摊上了,只有勇往直前,以人文理性的精神和健全的文化心态,冷静地对待音乐与周边的一切关系,尽心书写,以一部“另类”的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书呈现给学界,自当承受诸贤学术上的考察。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近代中国“新音乐”思想的形成	1
第一节 “中体西用”思想驱使下的“乐歌”考察潮	1
一、“中体西用”思想溯源	1
二、东西乐歌考察记	5
三、“近采日本”所得之经验	7
第二节 “乐歌”与教育的形上释	16
一、新式学堂中音乐课程设置之辨	16
二、“乐歌”之社会教化功能之辨	20
三、“乐歌”为课程必修科的社会呼声	30
第三节 “乐歌”制作技术理论的探索	41
一、“不可改人原曲擅动一音”的曾氏法则	41
二、“乐歌”之父——沈心工	52
三、纵横乐语间的“悲欣交集”——李叔同和他的音乐人生	62
第二章 中西音乐文化遭遇中的“意识形态”	73
第一节 “新音乐”思想中的“爱国尚武”精神	73
一、“爱国尚武”精神之思想基础	73
二、“爱国尚武”精神之社会要求	75
三、“爱国尚武”精神之时代表述与实践	82
第二节 “泰东泰西情理观”的形而上误读	88
一、西国风俗多有暗合中国之古训者	88
二、西乐“理性”，国乐“非理性”说	99

第三节	“国乐不能够和西乐争抗”的历史态度	104
一、	以西比中,中不如西的自卑感	105
二、	西乐是艺术与科学的学理定位	110
第三章	传统音乐融入“近世”与固守“本土”的两难境地	120
第一节	保存“国粹”、固守“本土”的音乐观	120
一、	固守音乐本土性的序幕	120
二、	从“国学”中寻找与“酥”对话的资源	130
三、	在“守缺”中传承和重释古乐价值	141
第二节	传统戏曲价值的近代转型	153
一、	戏场如学堂的音乐观	154
二、	改良戏曲音乐的愿望与实践	168
第四章	“西化”与“现代化”同论的音乐观	188
第一节	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中国音乐形象叙事	188
一、	“西乐中国化”外域形塑的历史追述	188
二、	“西乐中国化”的本土化实践	194
第二节	中国音乐“现代化”的文化自觉	201
一、	采西乐之长,补中乐之缺	201
二、	抱“中西观念”以创“国民乐派”	205
三、	采“谣乐”用“洋法”以定制乐基础	209
四、	取本国精粹,纳外来潮流,从调和中闯新路	214
五、	中国框架内的“五声”与“七声”价值论	216
第三节	“全盘西化”论影响下的音乐观	224
一、	“中国新音乐的建立要‘全盘西化’”口号下 的世界主义倾向	224
二、	接受“先进的西洋音乐”是必然选择	232
三、	向西方“乞灵”所意指的“进化”思维	240
第五章	无产阶级音乐思想的生成与体系化	249
第一节	建立“革命音乐事业”所预示的信仰	249

一、无产阶级音乐思想的萌芽	249
二、革命歌曲的兴起与传播	263
第二节 左翼音乐运动及其音乐思想的“价值论”	268
一、左翼音乐运动形成的历史	268
二、左翼音乐理论的价值属性	269
三、左翼音乐理论的使命	276
第三节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反映论音乐观	283
一、无产阶级音乐理论体系完善的思想基础	283
二、“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对音乐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	289
三、“音乐民族形式”的大讨论	297
结论	311
参考文献	326
后记	341

第一章 近代中国“新音乐”思想的形成

第一节 “中体西用”思想驱使下的“乐歌”考察潮

一、“中体西用”思想溯源

1840年,刚刚完成工业革命的大英帝国用近代工业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人自诩坚不可摧的大门,大清王朝的声威刹时扫地殆尽。清政府改变了夷夏之防、闭关自守的策略,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以魏源、张百熙、龚自珍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掀起了一场“放眼看世界”的思潮,对西方技术知识提出了“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的思想。^① 19世纪60年代,清王朝的统治再次面临严峻的危机,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分化,出现了新的政治势力——洋务派。在皇室内部以奕訢为代表,另有一些封疆大吏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他们面对这一大“变局”,意识到西方科技的先进之处,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国方略,从此中国被卷入世界体系,开始了通向全球化的历程。

中国近代教育运动伴随着其后洋务运动的兴起而发轫。“中体西用”作为当时的教育宗旨和办学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为中国教育(包括音乐教育)近代化作了最初思想和体制上的准备。其理论模式雏形,萌发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一书中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页。